

# “一带一路”支点选择视阈下的 中国—伊朗合作探析

潘萌 刘雪莲

**摘要:**“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其关键在于推进沿线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加强区域间多层次合作与共赢,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历史交往、经贸交流与合作前景仅是“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的必要条件,实现“一带一路”规划目标并能防范风险是支点国家选择的价值所在。布热津斯基以维系美国首要地位为基础,阐释支点国家的选择条件,其虽与“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目标具有不同,但对支点国家的选择框架与分析路径仍具有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带一路”的支点选择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即:地缘位置、地区影响、政局稳定与合作导向。伊朗位于地缘要塞,是地区性强国与中东极少数政权稳定、外交独立的国家之一,并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伊朗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亦具有诸多合作契合。现阶段,伊朗遭遇的内外矛盾虽为中伊合作带来了阻力,但亦提供了合作契机。同时,伊朗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具有海陆联运效应,从而更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进程。

**关键词:**中国 伊朗 支点国家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1-0021-09

**作者简介:**潘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雪莲,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DOI:10.14154/j.cnki.qss.2019.01.004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一带一路”的相关问题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探讨,关于“一带一路”支点国家的选择亦是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在前人研究中,一方面对“一带一路”的支点选择在理论层面进行了探索<sup>①</sup>。另一方面,在对于“一带一路”支点的选择多见以下几个观点,主要包括周边国家选择论<sup>②</sup>、港口选择论<sup>③</sup>、经济互补论<sup>④</sup>等。对“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伊朗合作问题,多数学者秉持地理位置重要论、历史交往论与经济互补论的观点<sup>⑤</sup>。综合前人研究可知,对于“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地缘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JZD027)。

①相关文章如杜正艾:《精选“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支点国家的意义与建议》,《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6期,第29-34页;郝琦:《“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支点选择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比较有代表的如肖阳:《“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中国周边战略支点的路径探析》,《边界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4期,第68-77页;赵雅婷:《“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战略支点的选择——以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合作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75-80页等。

③代表性的文章如张洁:《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战略支点的构建——兼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考量》,《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2期,第100-118页;凌胜利:《中泰合作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当代世界》2016年6月,第69-71页等。

④如王勇、希望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70-86页。

⑤相关文章例如陆瑾:《历史与现实视阈下的中伊合作:基于伊朗人对“一带一路”认知的解读》,《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53-69页;范鸿达:《中国在伊朗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政治环境与因应》,《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49-64页;杜林泽:《“一带一路”中的伊朗地位及中伊合作》,《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66-75页;姜英梅:《中国—伊朗金融合作研究与展望——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5期,第20-25页等。

论虽有一定探讨,但亦存在研究空间。首先,缺乏“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的动因分析。“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是形成由双边合作向区域合作转型的网状结构的转变。回顾文献,对于支点的选择多从单一的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忽视了海陆交汇地带的联动作用,缺少对“一带一路”海陆和合的价值与作用研究。同时,“一带一路”参与国和“一带一路”支点国不同,不能将历史交往与经贸交互视作“一带一路”支点国家选择的主要因素。对“一带一路”中的中伊合作问题,既要认识到伊朗在“一带一路”中具备的潜力,尤其是提升对伊朗海陆联结能动性认识,同时也应理性规避作为破碎地带国家所带来的风险。此外,“一带一路”的提出,表明了中国摒弃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维,而科学的地缘分析视角对当下的“一带一路”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从地缘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其海陆联运所带来的海陆整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海洋贸易结构与大陆贸易结构所产生的海陆对立性,从而有利于实现对边缘地带国家海陆分裂性的弥合,这可以体现“一带一路”有别于美国、日本、欧盟等相关国家“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合作性价值,因而将波斯湾的海陆链接点国——伊朗作为案例具有研究价值。

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伊方对中方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表示欢迎。双方将依托自身优势,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工业、矿产和贸易部关于加强产能、矿产和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契机,扩大在交通运输、铁路、港口、能源、贸易和服务业等领域的相互投资和合作。”<sup>[1]</sup>中伊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具有合作意愿与合作契合点。基于当前研究的不足以及现实的发展,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学中战略支点选择理论进行批判吸收与重构,探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支点国家的选择依据,并通过伊朗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一、“一带一路”实践与支点国家的选择与构建

关于支点,亦或称之为战略支点或战略支轴,最早源于军事战略的讨论范畴。在传统地缘政治学研究中,诸多学者曾对支点国家或地区的选择加以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的相关论述。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布热津斯基认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sup>[2]</sup>由此可见,布热津斯基评判一国可成为支点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应包括其具有敏感的地理位置,同时拥有国家政治或文化等方面的地区影响能力。布热津斯基确立了五大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即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其选择该五大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是在均势与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之下,以实现欧亚大陆均势与维系世界霸权为目标,根本上是以地缘权力的控制为其战略立足点。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传统地缘政治学对支点国家选择的理论逻辑为:战略思维影响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确定战略对手。根据战略对手的选择确定对战略对手具有影响力的支点国家。最后评估自身战略能力与支点国意愿,确立战略规划。

中国“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布热津斯基所讨论的以美国世界霸权维系为目标的支点选择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于支点国家的选择标准亦将不同。“一带一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以促进沿线国家生产力普遍提升为立足点,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零和、均势思维,“一带一路”以互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目标。虽然支点国家选择的出发点不同,但布热津斯基进行支点国家选择的思维框架值得借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选择某一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支点,应以顺利推进“一带一路”为先导,要注重“一带一路”的整体性与海陆联接点位置的考量,同时也要注重风险的规避。基于此,“一

带一路”的支点国家应考量的四大因素为：具备海陆联结性的地缘交通枢纽；具备一定的地区影响力；具有主权执行能力的政府；有与中国达成“一带一路”的合作意向。具体来说，在支点国家的具体选择中，需满足以下四大条件：

#### （一）地缘位置

地缘位置是选择某一国家作为支点的基本条件之一。这里的地缘位置决定了该国具有通过拥有战略性的地理区位而获得的干涉某种资源获取与归属的能力。在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范畴中，通常将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黄金水道”作为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亦将某些半岛或岛屿作为区域支点的选择。当下，对于支点国家的选择不考虑其军事作用，而更多地关注对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整合的作用。在“一带”和“一路”中有诸多与中国具备双边经贸和人文往来的国家，通过海陆联结支点国家进行有效的整合则可以使“一带一路”由两条带状走向区域性网状合作结构，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的整体性作用，促进“一带一路”由双边走向多边的合作机制。

#### （二）地区影响

地区影响能力是衡量一国是否可以成为支点国家的又一重要条件。这种能力一般来说是决定他国是否可以进入某一重要区域并获取某种资源的能力，它一方面取决于一国或地区本身具有的地缘位置，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国家的相对实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地区影响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具有较强的外交自主性。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在地区具有影响能力的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一带一路”推进带来示范效应，同时亦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的纽带或危机应对的可信伙伴，它们的自主性也可以减少由于对其他大国的过分依赖而带来的潜在风险。

#### （三）国家能力

对于“一带一路”推进中所选择的支点国家，其本身应是实践中的稳定基石，而非潜在的风险来源。与传统地缘政治思路不同，“一带一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手段，而推进经济合作需要有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一带一路”经过的中亚、中东地区，恰当选取稳定的支点国家有利于防范风险、降低成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很多经济合作都将在政府间展开，因而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和稳定的政局，对“一带一路”顺利推进具有重要影响，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利于保证“一带一路”在支点国境内顺利落地。“一带一路”的实践需要具体工程建设的开展，尤其涉及诸多基础设施建设等，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具体经济合作开展的重要保证。如果选取的支点本身面临着国家地方势力割据，政治局势动荡，则“一带一路”达成的相关合作意向将在具体实施中遇到极大阻力。因而，以经济合作为主要方式的“一带一路”，对支点国的政治稳定性与政府执行力具有更突出的需要。

#### （四）合作导向

除上述三点外，“一带一路”的支点选择中还应考虑的一大条件即是该国与中国合作的潜在导向。这种潜在导向来自于曾经的贸易合作基础，同时亦存在当下的经济相互需要。忽略合作导向而盲目进行支点国家的选择与构建无疑将增加资源浪费并加大地缘政治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发展倡议，支点的选择亦将首选具有经贸合作基础的国家。以往的经贸交流不仅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了当下合作的基础，同时也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带来了一定的认知与了解。尤其经贸往来涉及对象国的制度、法律、文化、社会氛围等诸多方面，以往的合作基础将为投资贸易等各项活动提供更多的经验。经济互补性体现了双方在经济交往中的相互需求，这将为“一带一路”的实际推进提供较好的契合点与对接点。经济上的互补性是“一带一路”合作的粘合剂，互补性的经济关系将更有利于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增强中国与战略支点国间的依存度。

总之，支点国家的选择一方面需要考察外部环境的客观价值，另一方面亦需考虑其合作的内

在条件与主观驱动力。因而，地缘位置、地区影响、国家能力与合作导向将是中国“一带一路”支点选择与构建中需要充分考量的四大因素。选择拥有良好地缘条件与国家影响能力，却缺失合作内在条件与动力的国家作为支点，将会带来资源的浪费；仅具有主观合作导向而不具备稳定政治环境的支点国家无疑将加大合作风险；只具有稳定的合作环境及主观合作意向的国家，仅可成为“一带一路”实践中的优秀合作伙伴，而缺乏成为支点国家的战略性。因而，“一带一路”支点国家的选择需要审慎综合考量内外多重因素，既要重视地缘条件与地区影响，也应重视合作基础与合作的内在动力。

## 二、伊朗——“一带一路”海陆和合支点国家

中伊两国自古以来交往密切，“虽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对西域不甚了解，但考古证实更早的时期，中国与西亚地区已有物质交往”<sup>[3]</sup>。自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后，中国与波斯正式建立起直接联系以来，在古丝绸之路，波斯商人成为了贸易往来与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历史上的传统交往是现今中伊两国合作的文化基础，亦为当下中国与伊朗“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更多的认同性。但是，中伊历史交往并不能作为当今“一带一路”推进中的中伊合作的出发点，现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伊合作，需要重新审视“一带一路”沿线状况，尤其挖掘伊朗位于“一带”与“一路”交汇点的海陆和合价值。

### （一）地缘位置

伊朗地理位置具有极大的战略性。伊朗位于西南亚北部，是连接中、西亚的战略节点，也是通往北非、欧洲的重要通道。此外，伊朗还控制着波斯湾北岸与阿拉伯海沿线绵长的海岸线，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扼守着波斯湾与阿拉伯海间唯一的水上通道。伊朗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线、南线，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伊朗都是必经之路”<sup>[4]</sup>。首都德黑兰是“一带一路”规划线路中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与“南亚欧大陆桥”的交汇点。因而伊朗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位于十字交叉路口的伊朗，由于其优越的地缘位置而具有着地域辐射的强大优势。伊朗现在已建或正建的跨境铁路，预计可形成联结中亚、西亚与俄罗斯的跨境铁路网。2016年4月开始，义乌-德黑兰班列每月至少开设一个，成为中国首列开往中东的铁路集装箱货运班列。“通过中亚建设新的高速铁路，运载中国产品的列车将不会在德黑兰止步，而是可以进一步延伸到欧洲市场。”<sup>[5]</sup>此外，拟计划建设的连接伊朗和阿富汗的哈夫-赫拉特铁路，接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从而“丝绸之路铁路将把伊朗南部港口与中国连接起来”<sup>[6]</sup>。同时，伊朗具有着优良的海港运输条件，并通过陆路实现联通。“依托波斯湾地区的恰巴哈尔港、里海沿岸的恩泽利、与土库曼斯坦接壤的萨拉赫斯口岸，伊朗可同时三个不同的方向成为中欧运输通道的枢纽。”<sup>[7]</sup>其中，恰巴哈尔港是伊朗通往印度洋的最佳通道，并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相距不远。此外，伊朗还具有波斯湾吞吐量最大的阿巴斯港。在管道运输方面，伊朗已经修建或计划修建多条跨境油气管道，并且与巴基斯坦在建的“和平管道”项目可与中巴经济走廊相连。因而，伊朗凭借其优越的地缘位置，具有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海陆和合枢纽的价值。

此外，由于伊朗富集了大量的石油资源，使其地缘战略位置更显突出。再加上其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石油命脉，因而成为关乎世界石油安全的重要国家。伊朗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已探明原油储量位居世界第四。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波斯湾地区70%以上的石油运输，海峡平均宽度70多公里，最窄处仅40多公里。“一旦发生对伊朗不利的战争，伊朗完全可以通过导弹控制海峡，也可以通过沉船或布设水雷等传统作战样式彻底封锁海峡，切断海湾石油对外运输线”<sup>[8]</sup>。此外，伊朗亦是唯一连接波斯湾和里海两大石油产区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地理位置的战略性加上其具有控制石油命脉的能力，使得伊朗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其国家的稳定对整个国际局势至关重要。

## （二）地区影响

伊朗是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伊朗国土面积在中东地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伊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早在 2500 年前，波斯人就建立了波斯帝国，至今伊拉克、中亚、巴基斯坦等地方都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现今，伊朗具有的地区影响力亦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伊朗是世界重要产油国、欧佩克成员国之一，不仅掌握了世界上 60% 的石油运输通道，在欧佩克成员国中，其年石油产量仅次于沙特。因而伊朗对于世界石油价格、石油产量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能力。其二，伊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伊斯兰教什叶派立国的政教合一国家，特殊政治体制与国家意识形态给予了伊朗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拓展影响的旗帜。又因其位于重要的地理区位之上，使得伊朗对于整个中东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能力。在伊朗的外交实践中，伊朗具有两重身份认同，即“伊斯兰世界领袖”与“波斯湾霸主”。在这两重身份下，伊朗以波斯湾地区为势力基础，不断拓展自身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能力。自 2001 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先后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塔利班政权的覆灭让伊朗失去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之严重对立的阿富汗，萨达姆倒台让伊朗收获了一个什叶派影响力大增的友好伊拉克。”<sup>[9]</sup>特别是近几年来，伊朗借打击 ISIS、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将国家政治影响，尤其是军事影响在中东地区成功拓展。另外，就军事实力而言，伊朗拥有在中东地区排名前列的军事力量，并掌握核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对中东、中亚包括阿富汗地区等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而，无论就经济政治影响力、意识形态号召力，还是军事实力而言，现阶段的伊朗无疑是能够左右地区局势的重要力量。

此外，伊朗奉行独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极世界。“伊朗是中东地区少有的不依附于大国的、独立的地区大国”<sup>[10]</sup>。伊朗与美国由于历史与现实多方面原因，关系长期冷淡。尤其在现阶段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核协定的情况下，两国甚至针锋相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具有诸多盟友，包括以色列与沙特等。伊朗与以色列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与沙特关系在地缘利益争夺等问题上矛盾重重。但是，伊朗外交奉行的独立性对于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伊朗外交中“倡导不同文明进行对话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认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反对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人权、裁军等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或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sup>[11]</sup>某种程度上亦与中国奉行的外交理念具有诸多共通之处。

## （三）国家能力

就伊朗国内政治而言，伊朗国内政府具备强大的主权行使能力，中央对地方具有有效的管控能力，因而其政局具有一定稳定性。“一带一路”合作中，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工厂等，与当地企业合作，在当地进行投资，派遣技术劳务人员等是常见形式。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将为“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在地方推进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推进能力。自 2011 年开始，“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北非国家，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未获得理想中的民主政治，相反，政权垮台与国家治理的崩塌使得中东破碎地带成为当下大国势力的角逐场以及极端组织的温床。相比之下，伊朗在中东乱局中独善其身，并成为中东地区“稳定绿洲”以及避免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的“压舱石”。即使在当下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加紧制裁的情况下，伊朗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仍有能力保持政权稳定。

伊朗之所以能够在近 40 年内外困局中，历经两伊战争、美国制裁、“阿拉伯之春”等诸多考验仍然屹立不倒，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伊斯兰共和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应对危机的调适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制中，包含着诸多民主政治要素，民主政治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已经逐步建立，并且成为了伊朗人民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渠道。诸多政治派系的竞争与政党政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成为表达不同阶层团体意愿的重要体现，这使伊朗政治体制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与调和性，以及危机处理的非极端性与灵活性。伊朗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东地区特殊的国

家与社会关系造就了伊朗独特政治体制的选择，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方可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与现代化变革。伊朗借助传统社会力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控与整合，例如在饮酒、犯罪等各项社会治理议题中宗教警察的介入，对民众起到有效的规劝与制约，这是伊朗进行有效政治统治和推进现代化的一种方式。总体来看，伊朗国内社会治安稳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强，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在地方范围内得以实践的有力保障。

#### （四）合作导向

伊朗与中国具有经贸合作基础，同时双方在经济上拥有互补性。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以前，因欧美针对伊朗核问题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致使很多西方企业相继退出伊朗市场，但中国企业仍正常与伊朗开展贸易活动。在伊朗遭受西方制裁期间，中国购买的伊朗原油占到其总出口的近一半左右。如今，中国是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伊朗原油最大进口国，且中国对伊朗长期保持贸易逆差。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5月21日，前五个月伊中贸易额达到15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08亿美元增长了41%。伊朗对中国的出口在五个月内达到80亿美元，同比上涨近60%。中国同期对伊朗的出口达到72亿美元，同比上涨24%。2017年前十个月，中伊双边贸易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2%，贸易额达到304亿美元。<sup>[12]</sup>

就伊朗自身而言，它是中东地区少有的具有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的国家，劳动力充足，且受教育程度高。现阶段，中伊贸易合作主要涉及贸易、投资、工程承包等领域。中国多家知名企业在伊朗都有投资，例如海尔集团、苏州阀门厂、北方工业公司、长春客车厂、东方电力集团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等，并已打下坚实的合作基础。自“一带一路”提出后，伊朗表示出积极的合作意向，并建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专门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伊项目合作对接工作。“伊朗的官员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地区合作，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对新丝绸之路计划有着积极的态度，并准备在安全、能源和交通三个主要方面扮演建设性的角色。”<sup>[13]</sup>此外，伊朗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会员国。伊朗正在推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亦与“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具有诸多切合。现阶段，美国重启对伊经济制裁，在伊朗面临西方投资纷纷撤离的形势下，更加深了对中国经贸投资的实际需求。正如在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朗时表示：“中方愿同伊方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双方要把能源合作作为‘压舱石’，在能源领域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把互联互通合作作为‘着力点’，开展铁路、公路、港口、矿产、通信、工程机械等领域合作，落实好有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把产能合作作为‘指南针’，加强经济产业政策沟通和对接，引导两国优势互补企业加强合作，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元化的产能合作格局；把金融合作作为‘助推器’，积极探讨研究新的金融合作模式，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合作。”<sup>[14]</sup>

综上所述，从外部地缘位置与地区影响方面考量将伊朗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支点国家，其优势在于：伊朗具有利用自身地缘优势，通过发挥其国家影响能力，推动“一带一路”在中东、中亚地区实践的能力，并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实践中的桥梁与应对危机的伙伴，因为伊朗本身既富有战略资源，亦把握战略资源命脉。同时伊朗外交独立自主，不受大国干涉，这亦有利于降低“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潜在风险。从国内政治与双方合作导向来看，伊朗具有“一带一路”具体实践中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意向和决心。伊朗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在基础设施建设与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较多需求，而中国“一带一路”推进的重要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与跨国投资、产能转移，因而双方具有合作的契合点。更重要的是，伊朗具有联结海陆的突出优势，具有实现“一带一路”海陆和合的优势。所以，综合内外诸多因素考量，伊朗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优选的支点合作伙伴。

###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伊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

#### （一）“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伊合作的挑战

## 1. 地理位置“双刃剑”与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下的潜在风险

理论上伊朗具备成为“一带一路”主要支点国家的潜质，但现阶段中伊合作并未实现两国预期高度。虽在地缘位置、地区影响、政局稳定与合作导向方面，伊朗在“一带一路”实践框架下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比较优势，但亦存在潜在挑战。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是一把双刃剑。伊朗的战略性地理位置与石油资源，一方面为其提供了成为地区战略节点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拥有敏感的地理位置与战略资源，伊朗一直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在二战期间，苏德战争爆发后，盟军为了保证伊朗不倒向德国，保障战略运输通道的通畅，主动出兵伊朗，并迫使礼萨汗退位。当代伊朗因其战略位置亦是地区敏感点与各方势力的重点关切，伊朗的国家稳定性对于中东、中亚地区至关重要。此外，伊朗在中东地区积极扩展影响力的同时，亦与中东地区其他强国产生地缘利益冲突。伊朗与沙特不仅在诸多地区问题上具有分歧，并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在也门、黎巴嫩等国家施加影响，二者矛盾以2016年伊沙断交为标志达到高潮。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与以色列一直处于对抗状态，这种对抗涉及地缘政治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坚实盟友，在对伊朗问题上，美以态度一致并互相影响。“沙特是中国的关键能源进口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以色列是中国在中东的重要科技合作国，尽管国家体量小，但是能对区域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sup>[15]</sup>因而在相关国际问题上，中国不得不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 2. 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凸显

伊朗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也面临着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上的诸多问题。例如在国内层面，伊朗税法 and 规定复杂，税费体制不健全，法律透明度低。“伊朗行政部门手续繁杂，普遍办事效率低，政策变化无常，对合同执行力度不强等是长期存在且难以根除的痼疾”<sup>[16]</sup>。伊朗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也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尽管伊朗中央银行规定，国内银行同国际银行间的融资往来可以不受伊斯兰法规的限制，由于伊斯兰银行的特殊性，国际上的传统银行在与之进行贸易结算、信贷投资等金融业务时，仍面临诸多不便”<sup>[17]</sup>。此外，伊朗面临着由于美国长期制裁所带来的附加影响。因美国金融制裁，伊朗金融体系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无法进行美元结算。外汇短缺，伊朗里亚尔兑换美元持续贬值，地下钱庄泛滥。加之在伊朗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内持续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等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伊朗社会不稳定性持续增加。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伊“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在具体实践层面面临的挑战。就中国而言，对伊经济合作也有顾虑。这种顾虑主要源于对于美国对伊制裁下带来的连带制裁风险以及伊朗所面临的内外形势的考量。

###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伊合作的机遇

虽然中国和伊朗在“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中面临一些实际挑战，但是这些挑战中蕴含着更多的机遇。现阶段受美国对伊重启经济制裁的影响，数家欧洲大型公司不得不放弃在伊朗的投资，以此保障其在美国业务不受影响。2018年5月16日，法国道达尔发布公告，称受到美国恢复对伊朗制裁的影响，道达尔无法继续在伊朗的南帕尔斯的气田项目；航运巨头马士基以及全球最大的油轮运营商丹麦 Torm 油轮公司已不再接受来自伊朗的新订单；作为巴斯夫的附属公司 Wintershal 也宣布无法与伊朗继续石油合作。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因为长期制裁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外国对伊投资将更为谨慎，尤其欧洲国家的对伊经济合作将受到巨大冲击。由于制裁导致西方公司纷纷撤离伊朗，这给中伊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曾经在长期面对美国的制裁中，伊朗承认“中国是在伊朗遭受不公正制裁期间，唯一对伊朗经济有实质性帮助的世界大国”<sup>[18]</sup>。在面临美国新一轮制裁的情况下，此时的伊朗更需要中国的投资与支持，这亦是中国争取伊朗的时机。同时，面对美国现阶段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对伊朗重启制裁的形势，一定程度上也为双方提供了走向合作的外部契机。

由于伊朗对改善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迫切需求，面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伊朗恪守在伊核

协议框架下展开行动，并试图说服协议各方保留伊核协议框架。同时，面对美国对伊能源制裁，伊朗通过允许私营部门出口原油的方式，以减少对伊能源出口的影响。此外，印度、土耳其等国也纷纷表示不会追随美国施加对伊经济制裁，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国际合作联合秘书苏迪尔表示，印度不会承认单方面制裁，只承认由联合国施加的制裁。同时，印度继续坚持与伊朗在恰巴哈尔港合作问题上的深入合作，而这一港口曾被视为印度应对中-巴瓜达尔港合作的重要项目；土耳其经济部长泽伊贝克奇表示，如果联合国就伊核问题作出决定或施加制裁，土耳其会遵守，除此之外，土耳其会遵循自身利益；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本计划在2018年7月访问伊朗，想在伊朗问题上彰显日本的独立外交，虽然由于美国的反对并没有成行，但也反映出日本对伊朗的重视。所以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并且很多国家正在以此为契机，寻求与伊朗的合作维度。因而，中国亦需发现美伊矛盾中的合作机遇。

基于现阶段中伊合作现状，未来中伊经贸合作可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在能源合作领域，伊朗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在资金与油气产业加工技术等方面具有不足，这亦是中伊双方互补之处。因而中国保持对伊能源进口的同时，增加对伊能源合作开发、油气行业全产业链的开发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伊朗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需求性交集。双方可在道路基建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以此为基础，进而拓宽钢铁工业等其他领域的合作维度。在金融领域方面，可以缓解由于长期制裁导致伊朗在融资结算等方面面临的诸多困难。现阶段伊朗已开始在国内货币结算方面进行尝试，以缓解美元结算带来的诸多困境。未来，中方可通过拓宽融资信贷业务方式等，推进在伊人民币国际化等，促进“一带一路”框架下金融合作的开展。

美国曾经在中东地区通过推翻他国政治模式，进而推行中东民主化战略，但这并未给中东地区带来稳定与发展。国家治理的破碎反而加剧了中东破碎地带的持续动荡。其失败根源在于，忽略中东地区经济基础现实的上层建筑跨越性变革，这种方式在民主价值尚未落地的中东地区无法带来稳定与发展，反而以民主的形式为各方势力提供了斗争的舞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进步才是解决中东诸多问题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是以经济合作带动沿线国家生产力提升为核心的倡议，其中东地区的实践亦将带来国家发展与地区稳定的机会。通过提升经济生产能力，帮助中东国家切实改善经济社会问题，将有利于中东地区发展与稳定。就伊朗而言，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伊合作，促进国家生产力提升与经济形势的改善，亦将有利于降低伊朗社会矛盾风险，促进伊朗政权稳定。现阶段，伊朗确实存在着与一些国家间关系的分歧与对立，因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伊合作需要更加聚焦于经济领域，从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规避风险，减少双方矛盾分歧。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活动无法忽视美俄大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存在，而正视美俄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范围，维持现阶段中东地区的基本稳定，并尝试协调美俄分歧，将有利于中国在中东地区规避大国争端与地区利益冲突所带来的风险。

#### 四、结 语

“一带一路”以经济合作为导向，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目标，这是“一带一路”与传统地缘政治均势、零和思维的根本区别。本文通过批判吸收与借鉴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战略支点研究思路，以规避“一带一路”推进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为目标，得出“一带一路”支点国家选择应着重关注地缘位置、地区影响、国家能力与合作导向等四个方面。伊朗是中东地区海陆联结的地理枢纽，且具有较强的地区影响能力，同时也是中东地区少有的稳定国家，具备发挥“一带一路”海陆整合的潜质。在现阶段面临美国对伊持续制裁的情况下，伊朗更显示出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因而伊朗有能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点国家之一。伊朗是伊斯兰共和国，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现阶段伊朗所面临的一些矛盾，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中都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因而亦需要用辩证的、发展的视角加以审视。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提升生产能力与经济水平，恰为伊朗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与稳定的助力。在面对“一带

一路”中伊合作的问题时,既需要正视中伊合作中的潜在风险并审慎规避,同时亦不能盲目夸大困难从而忽视中伊合作的价值。

在以往“一带一路”建设考量中,以双边经济交往为主导,对与海陆复合型国家的经济合作缺乏规划,因而这将影响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区域整体联动效应的形成。伊朗联结海陆,是中东地区海陆复合型大国与少有的政权稳定国家。将伊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国家,将更有利于实现中亚与南亚、欧亚东西方向的沟通,形成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由点对点合作向多国合作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发挥“一带一路”在带动欧亚联通发展的最大作用,以此形成“一带一路”海陆联运、互联互通的最大效用。从古丝绸之路的兴起,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贸易繁荣、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和谐符号。如今,“一带一路”虽由中国首倡,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平等参与的同时,也存在着共同建设与共同治理的责任。选择优良的支点国家亦将有利于联通和带动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实践,防范规避风险,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

####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www.fmprc.gov.cn/web/zyxw/t1334378.shtml. 上网时间: 2018-06-05.
- [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35.
- [3]YARSHATER 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I)[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537.
- [4]高潮.伊朗:“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国家[J].中国对外贸易,2016(3):72.
- [5]Iran,China and the Silk Road Train[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16/03/iran-china-and-the-silk-road-train/>. 上网时间: 2018-06-08.
- [6]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EB/OL].<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10/20151001131584.shtml>. 上网时间:2018-06-06.
- [7]陆瑾.伊朗发展战略怎样对接“一带一路”[J].世界知识,2017(3):55.
- [8]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一种全球多视角的解析[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17.
- [9]范鸿达.中国在伊朗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政治环境与因应[J].西亚非洲,2016(2):50.
- [10]华黎明.伊朗:“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与角色[J].社会观察,2015(12):10.
-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EB/OL].<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10/20151001131584.shtml>. 上网时间:2018-06-07.
- [12]相关贸易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EB/OL].<http://ir.mofcom.gov.cn/article/zxhz/tjsj/201707/20170702609009.shtml> 上网时间:2018-06-05.
- [13]阿哈迪.中伊应商讨合作细节[J].社会观察,2015(12):11.
- [14]习近平同伊朗总统会谈[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1-25(1).
- [15]范鸿达.中国在伊朗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政治环境与因应[J].西亚非洲,2016(2):55.
- [16]陆瑾.“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合作[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6):32.
- [17]姜英梅.中国—伊朗金融合作研究与展望——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J].国际经济合作,2017(5):22.
- [18]陆瑾.伊朗发展战略怎样对接“一带一路”[J].世界知识,2017(3):56.



**刘**雪莲，女，1965年1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法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全球化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曾出版多部著作及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权威杂志全文转载，多篇论文获得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研究项目资助。曾在美国杜克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做长期访问学者，到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做短期交流。